



鲁迅作品选讲

华中师范学院 中文系
华师京山分院

鲁迅作品选讲

上册

一九七六年十月

毛主席語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

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目 录

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	(1)
鲁迅的杂文·····	(64)

杂 文

十四年的“读经”·····	(108)
流产与断种·····	(127)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37)
纪念刘和珍君·····	(167)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188)
文学和出汗·····	(205)
流氓的变迁·····	(215)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229)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40)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259)
“友邦惊诧”论·····	(271)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284)
为了忘却的纪念·····	(307)

华德焚书异同论·····	(334)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347)
趋时和复古·····	(370)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381)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392)
三月的租界·····	(415)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430)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445)
死·····	(478)
给山本初枝夫人的两封信·····	(491)

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

一、幼年和南京求学时期

(1881—1902)

出身和家庭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城里的一个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进士，鲁迅出生时，正在北京做小官（翰林院编修）。父亲周凤仪，是个秀才。母亲鲁瑞，出身于农村，她以自学得到看书的能力。鲁迅很小的时候，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

少年叛逆者

鲁迅七岁便进私塾读书，读的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鲁迅从小具有叛逆的性格，他对这些宣扬孔孟之道的难懂的古籍并不感兴趣，对于束缚小孩思想的封建教育制度十分反感，在“正课”之外，常去搜求和阅读那些为儒者所看不起的历代的“野史”、笔记和小说，因为它们往往比“正史”更真实地反映封建社会的历史面目，使鲁迅更深切地认识封建文化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对鲁迅的思想影响很大。同

时，鲁迅对民族的和民间的故事、传说和绘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常背着儒师，用一种薄而透明的“荆川纸”描画各种小说的绣象。那时民间流行的通俗的有画的书籍，如《山海经》、《毛诗品物图考》等都是幼年的鲁迅“最为心爱的宝书”①。对民族和民间艺术的爱好，成为鲁迅后来对民族和民间艺术传统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以及创作上民族风格的提倡的开端。

幼年的鲁迅，每年都要跟母亲到农村的外祖母家里去住一个时候，这使他看到了一个与城里的官僚地主阶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接触了与地主阶级完全不同的人物——农村的劳苦农民。这是鲁迅最早同农民的联系。这实际的接触，使他看到了广大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也看到了他们刻苦耐劳、纯朴浑厚的阶级性格。农民的孩子和农村的事物使鲁迅感到新鲜、亲切，成了他后来许多小说题材的来源。鲁迅和农民的联系，他对农民命运的关心以及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正是他前期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基础。

“走异路，逃异地”——接触维新思潮

鲁迅出生和少年时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相结合共同压迫中国人民的时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迅速崩溃，造成了广大人民的深重苦难，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鲁迅十三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在北京的祖父因事被清政府逮捕下狱，接着父亲又病了三年，终于死去。鲁迅的家庭因此更加衰落。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他家里“几乎什么也

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②。鲁迅从自己家庭的败落，进一步看到了统治阶级的残酷、虚伪和腐败。他在家乡已不能再进学校，上流社会许多人对鲁迅一家的冷眼和侮蔑，也使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他坚决要“走异路，逃异地”③。于是他带着母亲为他筹集的八元路费，于一八九八年四月，离开绍兴前往南京。五月即考进江南水师学堂，次年二月，又改入矿务铁路学堂。

那是正值戊戌变法的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外国资本主义的输入，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十九世纪末中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维新派不敢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而企图在帝国主义帮助下，依靠清朝的光绪皇帝实现维新救国的目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现以前，它还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派的倡导下，中国思想界正在进行着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同封建主义思想的激烈论战。维新派大量翻译和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在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下，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新的报纸和书籍陆续出版，有力地动摇了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的严密统制，打乱了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使广大知识分子开始从封建文化专制下解放出来，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鲁迅到南京后，开始接触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他自己说：“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

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④鲁迅非常热切地学习这些新学问，不但经常阅读维新派的《时务报》、《译学汇编》，还读了不少资产阶级的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在一个星期天，他在南京城南买来了一本严复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严复是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国家找寻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一八九四年甲午之战以后，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情况下，他怀着强烈的救国热情译出了《天演论》。这是一部宣传英国著名科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论著，这部书的前半部着重解释自然现象，是唯物的，后半部着重解释社会现象（伦理过程），是唯心的。作者一开始就以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的丰富知识，展示了一幅充满矛盾斗争的物质世界的图景，揭示了“物竞天择”的进化规律，对当时中国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孔教，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在思想界影响极大，资产阶级改良派就是以这书所宣传的进化论思想为武器，同封建顽固派作斗争的。鲁迅完全被书中的新颖思想吸引住了，爱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个在南京的本家老前辈警告他，叫他不要读这一类离经叛道的书，鲁迅以轻蔑的态度回答了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侏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⑤

这本书使鲁迅第一次明白了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道理。少年的鲁迅还不可能懂得阶级斗争的学说，也还分不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界线，他是从积极方面理解和接受《天演论》的思想的。他由“物竞天择”的道理悟到中国民族的落后和危险的处境，如果不彻底改革，使国家富强起来，就不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有

立足之地，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他的斗争观点。其次，他由进化论也悟到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这样也就初步形成了他的发展观点。鲁迅接受进化论，和某些维新派人物以及后来的胡适之流，是根本不同的，他们利用进化论来鼓吹旨在保存封建制度的“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革命，鲁迅则利用进化论作为进行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

鲁迅在南京一共四年时间。这四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斗争给了帝国主义严重的打击，但由于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紧接而来的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和一九〇一年“辛丑和约”的签订，把中国推向了更深的民族危机之中，对鲁迅的刺激很大。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在鲁迅心里早已逐渐形成和发展了，《天演论》又给了他一个有力的战斗武器，这是少年鲁迅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二、留学日本时期

(1902—1909)

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

一九〇一年，鲁迅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因为成绩优异，第二年初被派往日本留学。

毛主席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

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⑥

青年的鲁迅，象其他爱国的先驱者一样，痛感于国家的落后和民族危机的深重，时刻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找救国的真理。他到日本留学，正是由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国力渐强，当时被认为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获得成功的范例。鲁迅在南京的时候，就研究过日本维新运动，“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所以决心到日本专门研究西方的医学。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業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⑦鲁迅把日本维新的成功归因于医学，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这种认识当时确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和力量；他满腔热情，决心以医学为武器，献身于祖国的革命事业。到日本不久，他就写下了下面一首《自题小象》，表明了自己的心愿：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鲁迅爱国主义精神的结晶，是他毕生为祖国人民献身的豪迈的誓言。

坚决站在革命派一边

鲁迅到日本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新运动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戊戌变法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的破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革命的旗帜，提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口号，组织了一个新的革命阵营。然而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思想界挑起了一场关于革命和保皇的大论战。日本的首都东京，是中国留学生集中的地方，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外的活动基地，关于革命和保皇的大论战，主要就在这里进行。在这一场论战中，鲁迅坚决地站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他到东京以后，除了在弘文学院学习日文，准备进医学专门学校外，就是赴会馆（这是革命派集会的地方），跑书店，听讲演，寻找新知识。同时也开始在留学生出版的刊物上写文章，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一九〇三年，他在《浙江潮》上发表《斯巴达之魂》，用斯巴达人抗击外来侵略的英雄事迹来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不久又写了《中国地质略论》，斥责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强烈要求保护祖国的资源和主权，不容帝国主义侵犯掠夺，声言“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觐者也。”⑧这是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精神的表现。

鲁迅同当时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同，他们往往把“推翻清廷”看成是革命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所以只热衷于狭隘的“排满”的宣传，很少想到中国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革新。鲁迅也热烈支持“推翻清廷”的革命，但更多的是想到政治上思想上的革新问题。还在弘文学院的时候，他就注意研究中国的“国民性”，思索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

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当时自然还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但他重视启发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要求解除封建主义对人民的思想束缚，这无疑有着重大的革命意义。

光辉的革命文学事业的开端

一九〇四年，鲁迅进了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但只读了两年，就由于一次课间的电影，打破了他的“医学救国”的信念。那是日俄战争的时候（一九〇五年），学校放映了战争的新闻纪录片，一个中国人被说是替俄军做了侦探，被日军捉住杀头示众。周围站着许多中国人，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这事给了鲁迅很大的刺激。这学期没有结束，他就到东京去了。因为他从此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⑨事情看来很偶然，事实上并非偶然，这是鲁迅到日本后长期研究“国民性”，探索革命道路的结果。

鲁迅一九〇六年从仙台回到东京，开始了他一生的光辉的文学革命事业。

一九〇七年，他和许寿裳等人在东京筹办文学杂志《新生》，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没有出成。鲁迅于是转而给中国留学生办的杂志写文章，并从事东欧、北欧弱小民族进步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这个时期，鲁迅认识了当时有名的学者和革命家章太炎，并且加入革命团体光复会；积极投入

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反对康、梁保皇派的思想论战，写了许多文章，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保皇派的反动性，系统地阐述了自己长期所思索的改革中国的主张。

早期革命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

他这时所写的重要论文有《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⑩等，这都是我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到鲁迅当时革命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批判了封建官僚的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指出洋务派“竞言武事”，实则都是“干禄”之徒，“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资产阶级改良派，“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这里所指的“众”，当然不是人民群众，而不过是当时“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改良派的阶级面目。“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这说明所谓“立宪国会”——改良派的主张，不过是他们“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的玩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鲁迅在文中系统地提出自己改革中国的主张，这就是“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他认为国家富强的根本在“立人”；“坚船利炮”之类，不过是“抱枝拾叶”，并非“根本之图”。他说：“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就是说，要国家富强，首先要启发广大人民群众觉悟，“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可见鲁迅把人民群众的觉悟，看成是国家富强的主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至于“任个人而排众数”方面，鲁迅介绍了斯丁纳、尼采等人的学说。这些人都是极端唯心的反动思想家，他们鼓吹个性和个人自由，叫喊现状的“虚伪”“恶浊”，完全是针对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的，是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效劳的。鲁迅当时对这些人的反动阶级性质，没有看得很清楚，他介绍他们的学说到中国，目的是反对中国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扫除一切阻碍改革的腐朽事物，所以客观上还有一定的革命意义。

鲁迅所说“排众数”中的“众数”，也不是指工农群众，而是指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以及一些拥护封建制度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包括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所谓“个人”，则是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认为在中国这样黑暗的封建社会里，唯有“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以掙击扫荡”的资产阶级革新家才能负起改革中国的重任。“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①“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邇。唯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这就是鲁迅当时的所谓个性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根植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在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仍有相当的革命意义。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热情介绍了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世界有名的爱国诗人和革命诗人，同时，也阐述了自己革命的文学思想。

鲁迅痛感于中国当时“文事式微”，封建统治阶级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只知道“漫夸耀以自悦”，“姑曰左邻已奴，右邻且死，择亡国而较量之”，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作为他们的“颂美之什”，实则是亡国之音。鲁迅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腐朽不堪了，为了唤起国人的自觉，不得不“别求新声于异邦”，为这古老的民族输入新血。他所以特别介绍了拜伦等诗人，就因为这些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死守真理，以拒庸愚”，他们的诗“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有助于中国人民的自觉，有助于中国革命的进行。

鲁迅当时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进化论，他认为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历来就充满矛盾和斗争，“平和之名，等于无有”，“生民之始”，即“以武健勇烈，抗拒战斗”，以“进于文明”。没有斗争，人类“势即入于零落”，使社会“故态永存”。鲁迅认为文学是改革人生的武器，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生活，“直语事实法则”，使人“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从而“更力自就于圆满”。文学作品应该是战斗的，充满革命精神的，而不是附和流俗，追怀往古的消极避世之作。拜伦等人的诗所以好，就因为其中“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能够破除人们的“平和”之梦，使人们勇于战斗，不断为人生开辟新路。